

跨文明对话书系

外国诗歌在  
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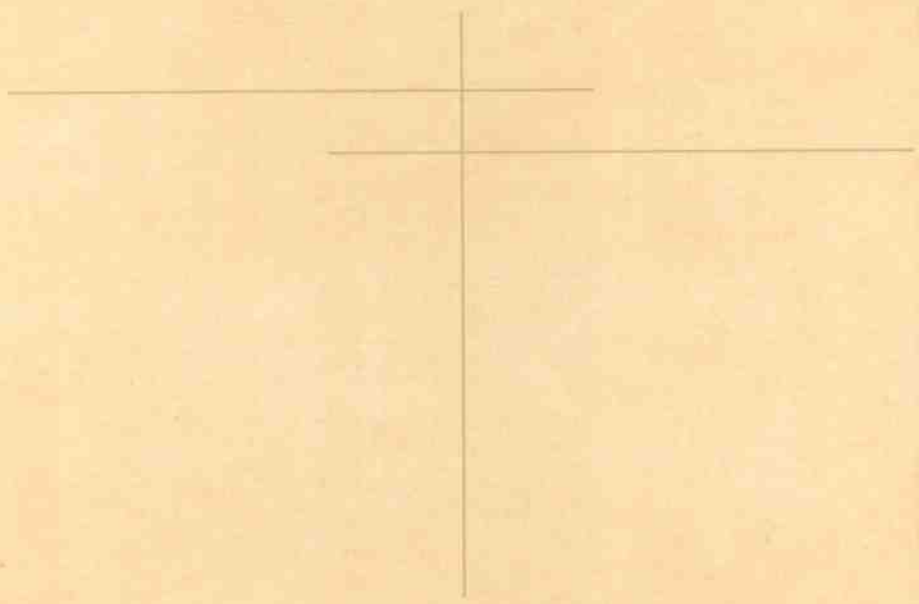


柏桦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责任编辑：谢艺波

封面设计：杨 艳



ISBN 978-7-80752-205-8



9 787807 522058 >

定价：18.00元

跨文明对话书系

# 外国诗歌在 中国

柏桦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诗歌在中国/柏桦主编. —成都:巴蜀书社, 2008. 6  
(跨文明对话书系)

ISBN 978-7-80752-205-8

I. 外… II. 柏… III. 诗歌—文学研究—外国  
IV. 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8054 号

外国诗歌在中国

柏桦 主编

- 
- 责任编辑 谢艺波  
封面设计 杨 艳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8.375  
字 数 22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205-8  
定 价 18.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 《跨文明对话书系》编审委员会

学术顾问：朱立元 曹顺庆

主 编：徐行言

副 主 编：汪启明 傅勇林 段志洪

### 编审委员会委员（按音序排名）：

柏 桦 段志洪 傅勇林 高 力 李 岗  
阮 航 施 维 苏志宏 汪启明 徐伯初  
徐行言 谢艺波 易伯伦 赵 静

## 总 序

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自古而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由来已久。然而自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以致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不少东西方学人都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乃至生活方式视为衡量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尺，把社会进步的理想目标定位于以西方发展模式为蓝本的现代化，或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普世文明。所谓西风东渐、西学东移，相当一批东方学人和政客也把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科技进步看做西方文明的必然产物，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寻求真理，甚至将扬弃本民族的传统，从器物、制度到生活方式上全面模仿西方作为实现现代性改造的唯一模式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归宿。东西方文明的交流遂呈现为单向的态势——以先进的西方文明征服、影响和改造其他“落后”或“野蛮”的文化似乎成为人类走向现代化生活的必然趋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由于交通、信息交流的日趋便捷，发达国家产业的转移和国际市场的开拓，不同地域和文明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和文化联系不断增强，人员、商品、信息乃至生活方

式、思想观念的流动和相互沟通日益增长，逐渐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各种复杂关系渗透交织的网络，全球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的大势所趋。然而，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将出现一种全球同质的“世界文化”或“地球文化”，相反，随着西方式工业文明内在矛盾的凸显、西方知识界的自省和一大批民族国家的重新崛起，本土化、地方化也成为全球化语境下许多后发区域维护民族文化遗产、保持自身文化特质的策略。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已不再是简单地演绎强势的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及其他弱势文明的征服或同化的模式，相反长期处在边缘的第三世界地区的文化传统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对现代性的诠释，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寻求走向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与道路。

尽管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乃至对抗仍难以避免，不同文化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与冲突依然存在，但和平发展、和谐相处毕竟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因此，对话正在成为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基本立场和方式。

何谓对话？对话的实质应是不同主体间双向互动的交流。哈贝马斯把对话作为不同社会阶层交往的主要形式，认为通过对话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正是交往行为的目的。而巴赫金则将对话关系看做无所不在的现象，他认为整个人类的语言、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乃至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之间都浸透着对话关系。毋庸置疑，对话的精神是交流、沟通与互动。这里有相互的凝视、好奇与欣赏，有积极的理解、借鉴与汲取，有主动的自省、调整与改造。总之，它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学与互渗过程，文化学所总结的关于文化交往过程中的互化与涵化现象都可以说是对话的成果。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文明间对话的基础应是平等、相互尊重，而不是仰望或歧视，更不是恃强凌弱的输出与同化。

那么，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应当怎样进行呢？显然，我们所理解的文明间的对话并非政客之间的会谈，也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文化交往，甚至不一定都来自实际的接触行为或交互关系。研究所产生的主题，而是包括能使文明之间产生碰撞与交流的所有可能形式——它有时借助于面对面的接触，相互汲取对方的优势，滋养自身的肌体；有时却并无直接交往，只是文明画廊中不同文化间差异的自然呈现，各自在对异域风景的注视中产生心有灵犀的感悟、启迪，乃至误读。此时，其中一方只需利用某种可以达成沟通的媒介和语言，将自身的文化特征与个性表达出来便已成为对话的主体。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将这一套丛书定名为“跨文明对话书系”。这里汇集了西南交通大学“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艺术与传播学院”、“外国语学院”一批教授和博士多年研究的成果，其中包括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经典成果的多视角研究，关于中外语言文学的交流与影响的个案分析，以及基于现代学术立场、运用现代方法进行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个案研究，可谓众彩纷呈。此中既有对过去的中西对话所产生成果的研究总结，也有在当下的语境中对他文明的审视与读解，还有对中华文明自身文化传承的整理与反思，其中自应包含着对新的对话的期许。相信这些学术探索对于读者加深对全球化时代中西文明的交互作用以及东西方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会有所裨益。

感谢西南交通大学出版基金的支持。让我们将这一套学术成果作为西南交通大学年轻的人文学科对正在走向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母校的献礼，并借以恢复“交通”这一术语最古老也最丰富的意蕴。

徐行言记于斑竹苑

2008年6月

## 序 言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一百余年，地覆天翻。它取道西方，效法欧美，“以极端短暂凝缩的形式”，上演了一场“迟到的现代性”。尽管这段文史常常为人诟病，背离传统，照搬西方，甚至只为取悦欧美读者而不断兜售它的“政治美德”和“东方风情”，但是不可否认，它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生成模式最清晰的一面，即“冲击——回应”模式已经成为我们解释文学现代化的主要路径，同时也成为“影响的焦虑”下不可回避的“现代性创伤”。

但是检视百年现代文学经验，历史与文学之间复杂的对话正构成“迷魅”的另一面。古典中国的想象魅域和记忆暗流正不断返回当下，重写一段“被压抑的现代性”。寻求中国文学自身的“剧情主线”已经浮出历史地表，并日益引起文学史家的反思。“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被修正为“借鉴革新”和“继承改良”的双线交汇，文学接受和文化过滤正成为理解现代性进程不可或缺的两面。“另类现代性”、“对抗现代性”、“反思现代性”诸等观念，众声喧哗，遥相呼应，决意要与那“单一的现代性”作一先锋，而着力提示“创化传统”的主导性力量。

诚此，文学发展的“外部取向”和“内部选择”都已不能单独构成“解魅”20世纪中国文学演进路向的利器。“跨越”和“综合”已经成为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关键词。“失语”的中国，已经开始在传统和现代的会通中重新发声。

## —

我们知道，自汉译英文诗《人生颂》<sup>①</sup>介绍到中国后，中国诗歌就日益与世界诗歌发生联系。虽说彼时之人“翻译那首‘长友诗’的‘用心’是要‘同文远被’，引诱和鼓励外国人来学中国语文，接受中国文化，‘夷面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但淘气捣蛋的历史却仿佛一个小孩子，狠狠地捉弄了中国人一把，这些翻译的外国文学反过来把我们给同化了！程度之深，以至于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发出了如下感喟：

亚洲所有的新文学同欧洲文学——同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的关系都比它们同本国旧文学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几年之前当我初步熟悉中国新

<sup>①</sup> 钱钟书先生曾撰文《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论证美国诗人郎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人生颂》（*A Psalm of Life*），中译由英国汉学家和驻华公使威妥玛（T. F. Wade）首先于1864年译为“有意无韵，似通非通”的汉语，再由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董恂加工润色成七绝“长友诗”九首，于1872年刊行在方睿师的《蕉轩随录》上）是汉译第一首英文诗，但据周振鹤先生考察，比《人生颂》还早的汉译诗是英国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的十四行诗《论失明》（*On His Blindness*），此诗由西方传教士麦都思译出，并在其主办的《遐迩贯珍》（香港出版的一部中文月刊）的1854年第9号上刊出。此诗整整比《人生颂》早出现10年之久。参见周振鹤《比钱说第一首还早的汉译英诗》，《文汇报》，2005年4月25日。

文学时，我曾经写道，旧中国的文学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文学之间有天壤之别，使我们难以相信它们竟是同一个民族的产物。

的确，现代汉诗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打下了不可磨灭的西方文学影响的烙印，沉淀了厚实的西方诗学资源。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一代又一代中国新诗人差不多把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诗歌艺术的内容、形式、模式，不论是精神层面上的，还是具体的诗艺技巧层面上的，都进行过仿效、移植、吸收并创造性转化。面对西方诗歌文化的中心主义与文化输出，我们在洞开门户的同时毫无顾虑地吞纳着异质文化的影响，承受内外冲击。这一历史进程中，既存在被动接纳的一面，也有主动“拿来主义”的一面；既有受其有形无形影响的一面，也有立足自身主体性上“反影响”的一面，而且后者似乎更为重要。

围绕这一生成模式与历史事实，国内外诗歌研究界顺其自然地采取了法国学派的方法与精神，“影响研究”也就伴随着现代汉诗的创作历程，程度不一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不同学者进行过这一方面的相关研究。一般而言，国内外比较诗学乃至比较文学圈将“法国学派”看成“影响研究”的典范，与“平行研究”、“跨文明”等研究一样，“影响研究”几乎也是与时俱进，结合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在不断发展、更新。虽然它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受到种种非议与挑战，但影响还是相当深远，富有经典意味。就现代诗歌文类而言，不同文化形态生存圈中的诗人个体离不开具体的历史语境，“影响”作为一种精神性现象客观而又广泛存在，虽然作为一种关系显得难以觉察、较为隐晦。概而言之，“影响

研究”在理清中外诗歌交流的事实上，在深入探究诗人创作和作品构成的内部机制上，既是目前仍然有力的研究手段，也是揭示西方诗潮在我国引入及衍化的最佳视角。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影响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不断遭受非难和指责。1958年9月的教堂山会议是最先也是最具冲击性的一次。这次会议标志着比较文学新领域的开拓，一个全新的流派——“美国学派”、一种崭新的理论视角——“平行研究”应运而生。他们反对那种“兴趣不在于文学本身，而在于文学的‘外传’”的实证研究法。因为它是在以一种文化沙文主义的态度处理那些具有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梳理本民族的“文学外贸”关系，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记账”。比较文学的“目的并不在一个民族的学派，而在于一种国际眼光”。“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个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平行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主张以问题为基础，“以关心文学现象之间的‘文学性’，即以美学探讨作为基本的方法立场，试图在基本无甚具体联系的前提下讨论某些文学现象之间的歧义和共相，深化我们对于文学的普世意义的理解”。

本书题记的“外国诗歌在中国”，正应从上述两个视角来看待和处理，即：它不但要考察那些与中国诗人、诗潮发生直接或间接亲缘关系的外国诗人和诗歌，它更要在一种世界意义上寻觅那些具有相似写作风格、主题、结构的异国诗人间的心有灵犀。这也就意味着，本书描绘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文学关系，即一种以平等为前提的“师生对话关系”，一种以对等为基础的“知音酬答关系”。

应当说,采用上述两种方法来探讨中外诗歌关系的论文、论著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汗牛充栋。从事中西诗学比较的学者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就研究现状的梳理与审视而论,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略作归纳:首先从宏观上看,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一直纳入到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系列中,呈现出清晰的历史脉络,自清末王国维始,它们就一直占据相当的分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钱钟书、朱光潜、梁宗岱和宗白华等人的著述,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外汉学家和一批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如刘若愚、叶维廉等人的研究便是例证。此外,港台学者如郑树森、周英雄、黄维梁、李达三等人,他们在中西比较诗学框架下,运用“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中国内地从80年代初开始,在经历过漫长的寒潮后,不少学者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如张隆溪、乐黛云、赵毅衡、饶芃子、曹顺庆等学者便是代表。就专著而言,继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之后,已有不少比较诗学专著引人注目,如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江弱水的《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论丛》等,其中既有宏观理论的比较,也有不同诗人诗派诗潮的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其次,就具体诗人个体研究的单篇论文来看,则呈现出数量众多、层次丰富、综合性强等特点。至于在文章的相关段落中偶尔为之的则更多,难以统计。总之,在这方面进行的研究,给人的表面印象是研究得已不少了。诸如此类的现象既重复又烦琐,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但是,其中显而易见也有不少盲点与空白,如现代派诗人(这里主要指20世纪前半叶的诗人)研究多、流派诗潮研究多、研究外语出身的诗人多,相对而言则是当代诗人

研究少，深入研究具体个案的少、受不同翻译体影响的诗人研究少，有些甚至是空白，如韩东、李亚伟、杨黎等新时期以来优秀的诗人便是。其次，整体上研究得不够，以前的研究是零星性的，不足成体系，整体感不强。再次，以往的研究宏观的多，也不泛牵强附会的，在具体细读层面上展开不够；方法也较为陈旧，尤其缺乏独异之视角。这一切给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广泛的思考空间。

## 二

不可否认，新诗诞生以来，现代与古典之间的理论之争已经过多地牵扯了人们的眼球，世纪之交，郑敏先生多次发表文章，认为新诗背叛了汉诗的诗歌语言与精神的约束，奔向西方，接受西方的诗歌标准。国外的一些汉学家有类似的观点，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等。现代汉诗是否真的“不合法”？到底该姓“汉”还是姓“西”？现代汉语诗人是否已不会“自说自话”，而只会“鹦鹉学舌”？这些问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现代汉诗的基本问题。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并期望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突破，便是本书的缘起和目的。

本书首次从影响与“反影响”的角度，整体性地衡量现代汉诗的西方资源和古典传统，其中既考虑到影响与“反影响”的张力与纠缠，也考虑到“反影响”不可忽视的主体复杂性；另一方面，将20世纪的现代汉诗看成一个整体，便于从不同流派、风格的诗人身上考察西方诗学资源多层面、多角度的输入与渗透、

移植与他者化，以及传统的现代化这一过程。梳理现代汉诗的西方诗学思想与中国古典渊源这一复杂性的敞开与呈现有助于深化对诗歌的现代认识。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谈论的“反影响”，已不再单纯局限在事实影响的互动层面，它的疆域应当涵盖影响之理论，换言之，它不仅是“影响研究”中主体复杂性的展示，同时也是平行研究中那些没有必然关联的互文性现象对影响理论的有效反驳。即，所谓“反影响”不只是一种文本上的技术路线，更是一种事实上的（影响）理论例外。

理论的研讨固然重要，但现象的意义同样不容忽视。“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的高空对决，“硬语盘空”与“软语商量”的技术对垒，这些是非价值的高阁争论，尽管可以让我们俯视现代汉诗的总体风貌，却也使我们错失了那些“枝蔓横斜”的细节。《外国诗歌在中国》一书，试图从细节出发，让现象发言。本书遴选了新诗百年历程中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流派，如闻一多、卞之琳、冯至、穆旦、“莽汉”、“非非”等为分析样本，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为理论基础，剖析他们与外国诗人、诗潮之间的互文关系。以个案梳理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以文本对照解读不同语境下的诗歌唤醒。

此次选录的11篇文章，分上下两编录入，上编“外国诗人在中国”，下编“外国诗潮在中国”。

上编着重介绍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美国诗人奥登、前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德国诗人里尔克以及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这些个体是如何具体地影响或照应了中国诗人穆旦、郑敏、韩东、王家新等人的诗歌创作。

《“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一文，具体描绘了波德莱尔在中国（1966~2001）的传播和接受过程。在这里我们将看到翻译的巨大作用。尽管用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性”来解说可能大而失当，但是，翻译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语体革命，即翻译体以其异质性的表述体系，对原有的汉语书写产生了冲击，为新诗写作注入了强大能量。虽然之前的许多学者都乐于关注译者对外文原文的改写和篡写，认为翻译应当是第二次创作，但是这篇文章却显示了另一种不同的态度，即文学的直译对现代汉语的写作更有冲击力，或者说一种绝对迥异的表述系统将带来一种“陌生化”的震惊。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张枣那里得到印证，他说：“朦胧诗那一代中有一些人认为陈敬容翻译波德莱尔翻译得很好，但我很少听诗人赞美梁宗岱的译本，梁宗岱曾经说要在法语诗歌中恢复宋词的感觉，但那种译法不一定直接刺激了诗人。实际上陈敬容的翻译中有很多错误，而且她也是革命语体的始作俑者之一，用革命语体翻译过来的诗歌都非常具有可朗读性，北岛他们的诗歌就是朗读性非常强。”

《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一文，在一片穆旦的颂扬声里发出异声，对穆旦的“非中国性”做出了的负面意义的评述，文章独树一帜，别具启发意义。全文通过对穆旦诗的细读以及与奥登诗的比勘得出结论，认为穆旦过于倚重奥登的写法和仰赖外来的资源，并未能借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构筑起自身的主体，这使得他面对外来的影响即使想作创造性的转化也不再可能。

《冯至：〈十四行集〉与中外诗歌文化》和《从里尔克到德里达——郑敏诗学资源的两翼》两篇文章在“容纳新知”和“消化传统”这个主题上做出了探索。前文以冯氏的《十四行集》与中